

庄子与克里希那穆提的比较研究 ——以哲学诠释学为中心

林雍信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内容摘要:

庄子与克里希那穆提(J. Krishnamurti)的思想体系虽非完全一致,却有可比较的相似处。两位哲人对于各自身处的纠纷紊乱的时代,并非汲汲经营去建立某种国家主义或体系制度,反而力主对人类的生命和精神进行内省而外化,并身体力行地指引出了另一条路。本文尝试采用迦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作为理论依据,察觉庄子和克里希那穆提的认知,最后都回归到实践哲学的中心。故此,把这两位哲人作为一个比较研究,有着其超时空互动的意义。比较的结果,大约可以归纳为以下的几点:一、时代的使命和环境的影响;二、时间和死生作为开启感知宇宙的门扉;三、智慧的觉醒和善用科学与技术;四、克氏的语言和庄子的文义再理解。

关键词:

庄子、克里希那穆提、比较研究、诠释学、实践哲学

一、时代的使命和环境的影响

庄子生活在战国时代，当时的社会此处于一种战乱频密的局势，人的生命在统治者的权益角力之际，显得朝不保夕。据陈汉章《上古史》的统计，战国二百多年中，各诸侯国间兵戎相见有二百二十二次，几乎每年都要发生战争，抑或每天都在准备打仗中。战争的次数非常频密，而规模也不断扩大，导致“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於境。”¹当时虽然有许多学说、学者、学派的出现，造就了百家齐放得的学术环境，但是统治者对于这些士人的思想之取舍，主要是建立在于战略的政治需要，举凡孙子、管子、韩非子等，或亦有一些为好名出发而收拢士人于旗下，譬如士人流聚的稷下学宫。在某个意义上来说，这两群的士人的物质生活和理念寄托，皆都离不开统治者这个重心。尤其后者，对于一个崇尚精神自由的哲人来说，是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妥协的基本原则。基于此，庄子拒绝接受任何统治者的征聘，即使过后要面对物质生活的窘困，但这依然是他毫无遗憾的抉择。

这种超越考量物质生活的崇高精神，并非仅仅是古人的遗风，在现代的世纪，科技的进步带来了更高的生活享乐，

¹ 《战国策·秦策四》。

但是人类最高的光辉仍然再度重现。相比其庄子, 克氏从小被通神学会安排带往英国上流社会学习, 他被视为未来领导世界的导师, 享受的是最高的舒适待遇。克氏生活的时代处于世战和印度独立、分裂时期, 战争牵涉的层面和区域比庄子的时代更大, 知识的重视和发展处于高峰, 由于统治者的野心和侵略手段, 理论知识被扭曲成了统治者自圆其说的指导思想, 譬如德国希特勒曲解尼采哲思为己政治目的所用; 物理知识被利用来发展更具毁灭性的武器, 举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利用来生产原子弹。²基于此, 克氏透视了政治家/统治者的手段和需要, 并不主张建立任何制度、主义等来作为人类发展的指导思想。他以实际的行动彻底的进行了革命, 就是解散通神学会为他成立的国际性组织——世界明星社, 并且把所有的捐款退回, 宁可身无分文也不作任何妥协。他知道自由必须超越物质生活和理念寄托, 而哲人的心理素质和修养境界让他能够完全彻底贯彻他的行为。庄子的哲思很好地说明了这点, 物质的“贫”不相等于精神上的“惫”, 即哲人所领悟的精神富足, 远远超越了物质的满足或理念的快

² 国际人文地理学大师段义孚就指出, 现代科技的重大胜利无法根除人类因骄傲而受惩罚的古代信念, 如使用核能是人类通天雄心的最新一种尝试: 它把一种只存于太阳的自然过程, 复制到脆弱的人类器皿里, 是否也终于释放一种人类所不能控制的力量, 最终可能导致地球和全人类的毁灭? 详阅段义孚著 潘桂成译《恐惧》, 台北: 立绪文化, 2008年, 页386。

感。

除了时代的不同，克氏所面对的环境有一个庄子时代所没有的产物：宗教。尽管庄子面对的环境有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但是却没有面临因宗教因素而发动的冲突事件和暴力行为。克氏处在于一个诸多主义兴盛和强势宗教崛起的坏境，他必须对这些迫切的社会问题作出回应。宗教极易被触动敏感地带而引发暴力行为，印度教和锡克教等宗教冲突在印度是屡见不鲜的社会问题，人权和法律对于解决这些潜伏的恶瘤疲乏无力。此外，政教混合的局面让的人与人的沟通、共识变得艰难。克氏面对的就是这一种宗教教徒冲突，而宗教信仰并未带来谅解与和平的局势。基于此，他没有从宗教教义中寻求解脱，而是重新去审视宗教、神和关系这些课题。当宗教的善恶教条没有好好为教徒所理解，它往往更容易成为教徒暴力主义的指导思想：以崇尚武力攻击为遵行法则，而带来更具毁灭性质的效果。³基于此，克氏对于关系、神和宗教的审视和反思，可以补充了庄子在这方面的空白处。也

³ “2001年秋季，“全球基要主义”现象在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心中成了前所未有的紧急课题。来自48个国家，超过2800名的受害者，于2001年9月11日摧毁世贸大厦并破坏五角大厦的恐怖攻击中罗难……美国、英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在此攻击之后，终于对基要主义式的宗教暴力有了全面的认识。现今宗教基要主义已真正展现全球的格局，其惊人的力量已经无法否认……”引自 Gabriel A.Almond 著 徐美琪译《强势宗教》，台北：立绪文化，2007年，页9。

让我们更加贴切明白了一个现象——何以庄子的体用论可以道和自由作为概括，而克氏则以自由和爱作为体用的重点。诚如迦达默尔所说的，实践智慧是一种善的引导力量，唯有这种引导力量才能够有意义并理智利用科学和一切人类的力量，并能为这种利用负责。⁴

二、时间和死生作为开启感知宇宙的门扉

时间是人类用以计量而产生的一门概念，但时间概念却产生辐射而带来了副作用。时间被人类利用来作为衡量得失，评估优劣及加强记忆和情绪的工具。时间感造就了人的认知囿于局限，因而使到人类对于生命、存在和宇宙的认知，愈来愈局限于记忆。而记忆却是代表着过去的已知范畴内。庄子拒绝时间感的束缚，认为智慧成熟的最高点，必须是时间感所消解的时候，因此主张人的认知要回归到“未始有封”、“堕聪明”等的境域。当时间感被强调的当儿，人就会与现在所处于的境域，精神上产生了隔离的状态，因而触发了环境和思维的冲突。基于此，人要回归到认识的起点，方才能够保持清澈的敏感度，对于事物具有一种鸟瞰的视野。克氏

⁴ [德]汉斯-格奥尔格·迦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页 22。

对时间感谈得相当深入，他认为时间感象征着过去、已知，而人类必须从中跳脱而才可以解脱。如果执着于过去的已知，人的行为和发展只是一个已知的演绎，没有带来革新。换句话说，已知是一个“碎片”的象征，不是一个真实的“整体”，我们无法通过这个“碎片”去洞悉整体的实相，这个“碎片”只会让人的认知停留于物质表层，无法深入性质的内在存有。内在象征着未知的探索，也是有关于宇宙的一切存有。

死生是人类自古恐惧的由来，认知如果无法超越死生这层的框架，那么就很容易被恐惧包围。学者段义孚曾指出，现代年轻人虽受过良好的教育，却会感觉更受无形的恐惧困惑，常常担心自己和人类的未来，总有一种“明天会更差”的不自在感，觉得未来保证会带来的只有生态危机、种族冲突、世界性饥荒和核子灾难。⁵这些恐惧都与生命的存在受威胁，抑或生死的课题有关。庄子论气的聚散来诠释了世间物质的运动和变化，但这只是物质上的认知，人的能动性可以超越物质的变化，但是必须透视死生的生命问题。所以庄子更进一步的探讨了人的死生反思，认为人的死是宇宙中的物质变化，合乎道的自然法则，无须悲伤或贪生惧死。另外，他也提出了死以后是一个未知的境域，无须以现在的环境条件反射

⁵ 段义孚著 潘桂成译《恐惧》，台北：立绪文化，2008年，页380。

作为比较。克氏则认为人的死生是一体的,从来没有被割裂分离。他认为人以为时间感而把死亡推向未来,因抗拒这一天的来临而产生恐惧,⁶进而因恐惧而发明了种种的宗教说法,来掩盖或转移恐惧的注意力。因此,人有必要从时间感而导致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才能大胆地去观察死亡的真相。庄子提出了“方死方生”的说法,而克氏则认为死生是没有被隔离。两位哲人主张死亡不是一桩可怕的事,反是人能够通过这层次的超越,进而摆脱恐惧感和时间感,让人的狭隘已知得到终结,迈向宇宙未知的广阔无垠之境。囿于时间感和死生都是一种局限,人的认知会因此而变得渺小,无法观察到宇宙的一切存有,并非碎片聚集而成,是整体道的自然法则在不断运转。人的死生超越,就是对生命哲学的最高认知。

三、智慧的觉醒和善用科学与技术

科学和技术的成熟是人类得以摆脱原始森林求生的一个分水岭。战国时代的工具技术大跃进,不仅让农作物的生产

⁶ “人类心灵是一种福中带祸的天赋。一方面,它向我们呈现一个巨大的、有秩序和美丽的世界,但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让我们预想到混乱、邪恶和充满死亡的未来。”引自段义孚著 潘桂成译《恐惧》,台北:立绪文化,2008年,页390。

倍增，更进一步塑造了比以往更精良的武器，为战争提供了极大的资本。庄子对于工具的运用，抱着一种重新审视的心态，相比世人强调着功利的价值，注重工具可以带来的生活条件之改变，他却是反思工具滥用或过分强调功利的长远后果。庄子身处社会的地下阶层，按照常理他应该更加理解工具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但是庄子对于工具运用的审视却是要合乎环境的平衡发展，所以他反对树木仅仅作为柴薪、栋梁或船只等等的“有用”之途。“有用”和“无用”之间的争议是相对主义之下的产物，但按照诠释学的观点，相对主义几乎就是那些对真理或解释应是什么抱有固定看法的人所构造的概念虚构物。⁷庄子对技术的运用，有着“善”、“灵活”、“创造性”的特征，他主张天地间每个事物的存在都有它的大用，不可墨守陈规。

二十世纪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到达了顶峰，技术的革命转变了人类的生活模式，但是相对而言，环境的生态也不断地受到了更严重的破坏。在某个意义上，历史反复证明人类是具有摧毁欲的生物。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事中，胜方会夷平败者的城市，让即使是对方的主神亦丧失栖身之处。如今人类已从冷兵器过度到热兵器，但摧毁欲却不见减少，

⁷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3。

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也仍然潜伏着。⁸基于此，克氏提醒世人对滥用科学和技术所造成的后果，反对世人一味追求发展科技，盲目地崇拜知识效能，是有其深切的体会和认知的。然而，克氏同时声明它并非反对科学技术，只是要提醒世人认知智慧和所谓的科学知识无关。克氏没有极端的认为人类应该回到过去的原始生活，因为那样做很不实际同时也不可能发生。

庄子和克氏对工具、知识的主张，十分符合亚里斯多德（简称亚氏）过去的阐释。亚氏认为学问可以分作科学方法、工具技术和实践智慧。⁹最重要的是，实践智慧乃作为运用前两者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只有有智慧的人，才可以依善的目的去理用方法和技术，并对它的后果完全负责。学者洪汉鼎指出实践智慧有 5 大特征：（一）其探讨的对象是可改变的事物；（二）实践智慧的本质是一种不同于生产或制作的践行；（三）实践智慧的践行本身就是使人趋善避恶的目的；（四）实践智慧考虑的乃是对人的整个生命有益的事；（五）实践智慧不只是针对普遍事物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对特殊事

⁸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页 3。

⁹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页 311。

物的知识，并且在经验中起了重大的作用。¹⁰由此可臆想，当人类没有以实践智慧去掌握科学和技术，往往就会形成了局限、负面以及滥用。基于此，利用科学必须以善作为出发点，并以人类的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

基于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克氏和庄子不是保守、消极和虚无主义的倾向，相反地，他们透视了知识仅仅作为发展科学和技术，以功利作为目的的祸害。两位哲人以善作为实践智慧的目的，抗拒的是就是把人的生命投注于物质的研究（科学和技术），而遗忘了生命活着的根本意义。按照哲学诠释学的观点，诠释学是理解艺术的理论，但这种或那种唤起意识的形式都来自于实践，离开了实践才会落入纯粹的虚无。这也是从诠释学的问题出发所重新证明的知识和科学的特殊意义。¹¹可见，诠释学强调对现代的文明有一种清醒的认识，本身就需包含了批判和反思。

四、克氏的语言和庄子的文义再理解

迦达默尔有曰：“作为艺术的诠释学，是一门会让我们充满惊奇的艺术，因为它能理解和解释出那种对我们封闭的

¹⁰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页 314。

¹¹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页 311。

东西——陌生的话语或他人未曾说出的信念。”¹²囿于时代和环境的关系,庄子距离我们有一段久远的时空,而克氏却生活在二十世纪中。欲理解庄子的思维,许多时候主要考究他所留下的文字为依据。然而通过许多学者的注疏、解读等,甚至增删的工作,后人能够接触的原文多少已被经过了添加或删减。甚至乎,经过近代种种主义的有色眼镜,庄子往往被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虚无、消极、悲观等等。庄子的认知,感知和实践到底处于一个怎么样的境域,是现代哲学工作者欲还原和体悟的方向。我们以自己有限的已知,是否能够去认识这个古老又超越时空的庄子?庄子到底要告诉世人什么?我们如何在这个哲人的身上吸取和参考他的智慧,取得共鸣的语言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克氏和我们生活在同样的时代和环境,他处身与庄子相近的一种环境,即是战乱频密、学说繁多和技术突破的年代,他经历了这些客观的环境因素所带给人类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并通过了自身修养上的工夫体悟来对周遭的人和事作出回应。克氏展现了东方哲学家传统的一个特色,和庄子非常的相似,即是不强调建立或推行某学派的义理作为生活、社会的指导思想,而是彻底否定一切形象化的权威,把人类认知和改革的主要回归自

¹² 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二卷,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出版社, 蒂宾根, 1986年, 页93。

身。基于此，庄子和克氏本身所达致的修养境界，使他们在思维上能够起着交会和共鸣。

对狄尔泰来说，理解就是重新体验过去的精神和生命，他说：“如果从对理解的任务中产生了自我体验到的精神关系，那么人们也将此称为从本己的自我到某种生命表现之总体的转移。”要理解庄子，我们不是以克氏的想法作为注释，而是通过比较和参照，利用这克氏现代的语言，去剖析哲人如何去看待人世间的总体问题，如何超越目前一切有限的已知范畴，进入未知的神秘领域，即是作为一切存有的宇宙，或者宇宙的一切存有。到底先秦哲人叙述的天人合一，是一个怎样的可能境界？庄子对这个神秘的宇宙留下了不少的笔墨，但是一些后人往往希望把它知识化，以研究文学、艺术、心理的角度去解读，因而陷入了和局限在所谓的唯心主义、个人价值判断之思维。诠释学却提醒了我们，去质疑这些视角是否因相对关系而产生的概念虚拟物。实际上，在哲人的世界，是一个广阔无垠的大宇宙。人惟有超越一切的已知、概念，以及摆脱时间感的思维，是一种停止向外追寻和向内退转而带来的心灵革新之运动。克氏和当代的物理学家大卫·博姆对话时，所运用的语言很好而清晰的告诉了世人，宇宙不仅仅是通过物质观察上，抑或物理知识所能达到的认知，这个方向对迈向真理、真知是说一个歧路。人类不是仅限于

物理知识下的生物, 不仅仅囿于物质作用和反作用的思维, 或者信仰的教条去单向化的认知, 而是站在宇宙的秩序(和谐、两行)鸟瞰一切。人类必须以实践智慧作为生命哲学, 才能够拥有一个哲学的生命: 善和真理。

此外, 采用哲学诠释学理解两位哲人的思维之时, 需要说明的是, 这个理解的本质并非更好的理解, 而是“不同的理解”。正如迦达默尔说的: “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 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 把理解中存在的这种创造性环节称之为‘更好的理解’, 这未必是正确的……我们只消说: 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 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 这就够了。”¹³ 迦达默尔也以“明显”这一概念来揭示真理的性质, “明显的东西也是某种使人惊异的东西, 犹如一道新的光芒的出现, 通过这道光芒使观念的领域得到了扩展。” 诠释学在比较两位哲人的思想时, 成功地扮演了这座光芒的桥梁, 让哲思的内涵得以扩展和显现出来。

由于篇幅和时间有限的关系, 本文无法很全面的探讨克氏和庄子的思维, 这两位哲人之间尚有虚许多尚待开拓的比较研究空间。例如两位哲人的生死观和修养论, 通过阅读, 可以发现其中有许多精彩的交会。此外, 哲学理论作为开启

¹³ 迦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第二卷,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出版社, 蒂宾根, 1986年, 页301-302。

哲人思维的入门钥匙，但是笔者对于哲学理论的掌握，仍处于一个不成熟和尝试的初学阶段，因此在许多方面无法很清晰的论述，抑或作出很深入的分析。

A Comparison between Zhuangzi and Krishnamurti from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pproach

LIM Jong Shin YAM Kah Ke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Malaya

Abstract

Although the thought systems of Zhuangzi and Krishnamurti are not completely consistent, they have comparable similarities. In the chaotic times in which they lived, both philosophers did not strive to establish a certain kind of nationalism, but instead advocated introspection and externalisation of human life and spirit, and pointed out another way with their own practic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se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s a theoretical basis to detect that the cognition of Zhuangzi and Krishnamurti finally returned to the center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Therefore, taking these two philosophers as a comparative study has its significance of super-time and space interaction. The results of the comparison can be roughly summarised into the following points: 1.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environment; 2. Time and life and death as the door to perceive the universe; 3. The awakening of wisdom and the good 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 Krishnamurti's language and Zhuangzi's meaning are re-understood.

Keywords

Zhuangzi, Krishnamurti, comparative studies, hermeneutics,
practical philosophy